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

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 编

周 勇 程武彦 ◎ 丛书主编

[英]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 ◎ 著

谢应光 ◎ 译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112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

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 编

周 勇 程武彦 ◎ 丛书主编

〔英〕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 ◎ 著

谢应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 / (英)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著;谢应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9

ISBN 978-7-229-11311-7

I. ①长… II. ①阿… ②谢… III. ①游记—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6789号

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

CHANGJIANG SANXIA JI CHONGQING YOUJI—WANQING
ZHONGGUO XIBU DE MAOYI YÜ LUXING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编

周 勇 程武彦 丛书主编

[英]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 著 谢应光 译

责任编辑:曾海龙 吴 昊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彭平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25 字数:259千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311-7

定价: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周 勇 程武彦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川平	艾智科	刘兴亮	刘德奉	张 波
张荣祥	李 波	李廷勇	何智亚	邹后曦
黄晓东	常云平	曾 超	蓝 勇	戴 伶

重庆史就是中国史、世界史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总序

周 勇

重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重庆也不例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西方列强以利炮坚船侵入中国，中国被迫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重庆之于沿海，晚半个世纪。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签订《南京条约》，西方列强强开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出海口岸；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西方强开天津、南京、汉口等 11 个通商口岸，其势力伸入长江流域中下游；随即剑指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云南。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英国工商界不断催促其政府沿长江西进，把上溯重庆，强迫重庆开埠，进而夺取长江上游，作为开辟中国西部市场的首要目标。从 60—70 年代，英国外交官员、冒险家、企业家、海军小组等纷纷进入四川重庆，考察调研。1874 年夏，英、法洋行更雇用民船私载洋货上驶重庆，直接闯关。1876 年，英国借“马嘉理事件”，强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英国取得“派员驻寓”重庆和宜昌开埠等特权；同时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先决条件——轮船上驶重庆，其最终迫使重庆开埠的计划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随后，历任英国驻重庆领事一面加紧调研，一面游说鼓动。此举直接催生了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建造轮船驶抵宜昌，迫使中国政府与英国再谈重庆开埠条

件。1890年3月31日，中英两国在北京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正式取得了重庆开埠的条约权利。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成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

重庆开埠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西方列强在中国长江上游取得的最西端的通商口岸，英国的得手意味着欧美列强在这一领域对中国特权的“一体均沾”。1896年，后起的东亚列强日本又通过《马关条约》强迫重庆对日开埠。重庆成为列强共同侵占的半殖民地，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开埠，也开启了中国西部地区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活跃着一大批外国人的身影。其中以英国为最。从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就掀起了一股“游历”中国西部的热潮。尤其是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准许“洋人”进入中国内陆，更成为英、法、日、德等外国人踏入中国内地游历、考察、传教的保障与凭证。此后，大量英国人渡海远行，溯江而上，踏进这片少人涉足的陌生疆域。他们身份各异、目的多样，有的直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服务于国家对外扩张战略；有的探险、游历，间接地向世界传递出中国西部的社会信息。令人瞩目的是，他们将沿途的见闻诉诸笔端，回国后到处演讲，并以日记、游记或报告的形式出版发行，扩大影响，也为我们今日的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我从1979年起，开始系统地学习历史学，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期间，读到不少洋人有关重庆的著作。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威海卫副司法行政长官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又译为：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对川江航道、重庆煤矿、养蚕业、水利灌溉以及白蜡产业的考察；有英国记者、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美国地理学会会员丁乐梅（Edwin John Dingle，又译为：埃德温·约翰·丁格尔）对川江航道、入川陆路、四川人口、铁路、工商业以及新式教育等的综合考察；英国作家、探险家以及第一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院士毕晓普女士（J.F.Bishop，F.R.G.S.），她对中国西部进行了历时15个月的实地考察，尤其对长江上游和重庆的山川风貌、人情风土、社会环境等，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说明，进而提出重庆是“中国西部的商贸首都、清帝国最繁忙的城市之一”，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尤其是有促成重庆开埠并第一个带领轮船驶抵重庆的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Archibald John Little），他留下了名篇《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曾译为《长江三峡游记》或《扁舟过三峡》），这是一部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考察备述无遗的作品。有日本外交官、著名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留下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记载了他在全国各地游历的见闻，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四川重庆的“栈云”和“峡雨”。有英国派驻重庆领事官谢立山从重庆到中国西部地区的深入考察，留下的《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一时轰动，重庆乃至西南逐渐被西方人所熟知。有天主教川东教区法国传教士华芳济（P.Francois Fleury）留下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经过》，详细记录了余栋臣起义过程中他被俘的经历。有法国海军上尉武尔士（Émile Auguste Léon Hourst，又译为：埃米尔·奥古斯特·莱昂·乌尔斯特）留下的《长江激流行——武尔士上尉率法国炮艇首航长江上游》。这是目前所见的，唯一的由法国人撰写的有关川江航行和重庆城市历史的著作。有天主教重庆教区大修院院长古洛东（Gourdon）撰写的《圣教入川记》，记述了明朝以来天主教进入四川和在四川的活动。还有英国的冒险旅行家托马斯·索恩维尔·库柏（Thomas Thornville Cooper）撰写的《蓄辮着袍的英国贸易先锋——溯长江而上的探索之旅》，他是西方最早一批敢于直面风险穿越中国腹地的旅行家之一，也是近代英国到西藏东部探寻商路的第一人，等等。

这其中，有三类史料的量是比较大的。

首先是围绕重庆开埠谈判的档案史料。重庆开埠共进行了三场谈判，一是1875—1876年，中英烟台谈判，最终以签订《烟台条约》而告终，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前提条件。二是1887年开始的中英宜昌谈判。这场谈判的主题就是重庆开埠，谈了近4年，到1890年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三是1895年，中日马关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重庆对日本开埠。1980年，我开始研究重庆开埠这段历史时，所

能依据的只有收录在《清季外交史料》之中的中国档案史料。近40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重庆开埠的史料大大地扩展了。首先是日本档案史料的公布。2001年，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建成开放，公布了近代以来日本内阁、外务省、陆军、海军的公文书以及其他记录当中选出的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关系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政府有关机构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资料，相当丰富。里面不但有中日马关谈判关于重庆的史料，更有日本人打探到的中英两国在烟台、宜昌谈判中的重要情报。后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其次是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有关中英谈判重庆开埠史料的解密。我曾两次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档案，收获极丰。那里保存着19世纪以来英国与中国交往的丰富档案，特别是1875—1876年中英烟台谈判、1887—1890年中英宜昌谈判中关于重庆开埠的原始文件，包括两国之间的历次照会、双方谈判代表给各自国家的报告、有关当事人留下的书信、签署条约的往来磋商函件，特别是《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正式文本，其详细、生动，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其中还包括中日马关谈判的记录抄件。日、英档案的披露，让我们完全回到了100多年前中英、中日关于重庆开埠谈判的历史现场，似乎还能感触到那段历史的温度。这无疑为我们在中国档案之外打开了一扇观察重庆近代历史的窗户，在近代历史大潮中的重庆开埠的历史就更加清晰和生动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其次是重庆海关档案的使用。1980年，我开始研究重庆开埠时，得到我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者与创始人、海关史学家汤象龙先生的指导。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前往英法德学习研究经济史，搜集到1891年重庆开埠时的海关调查报告。先生无私地将其借我使用，我也从此开始运用旧中国海关档案来研究重庆开埠的历史。随后，我又有机会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同仁共同翻译整理了一批重庆海关报告。这是当时海关关员搜集到的各类情报，每月、每季、每年向总税务司和英驻渝领事呈报。以后形成惯例，每十年编制一份综合性报告。凡重庆地区鸦片、贸易、人口、科举、教育、地势、出产、民船、本国钱号钱庄、信

局、都会、会馆、航业、税收、金融、财政、河道、邮局、电报、行政、谘议局、司法、警察、监狱、农业、矿山、制造业、市政、医院、物价、工资、陆海军、铁路、省议会、灾荒等，均在其中。即使四川省以及湖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陕西的有关内容也有不少。这些情报搜罗范围之广泛、内容之详尽、地域之宽广，令人惊叹，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些史料是中国的档案文献所不可替代的，极为宝贵。

再次是《华西教会新闻》的影印出版。《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是西南地区最早以英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也是近代四川办报时间最长的报刊之一。它于1899年2月创刊于重庆，1943年底停刊于成都，跨度长达45年。该刊旨在加强华西各教会传教士之间的联系，因此大量记载了当时教会，特别是华西的教会活动状况，同时也从教会的视角记录了那一时期重庆、四川的历史细节，在中国新闻史、出版史、宗教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凡45卷。

这些宝贵的史料对我的历史研究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我深知其对于学术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很早就有一个愿望，将这些珍贵档案史料整理出来、翻译出来，公开出版，为我们的城市留下一笔基础性的历史记录，也让更多的学者可以使用，这对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发掘弘扬都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市委老领导孟广涵和家父创办了重庆市地方史资料组、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团结学界，扎扎实实地做重庆历史研究的基础建设。我们几个青年的提议立即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于是我和搭档刘景修整理翻译了一部分重庆海关档案，以《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为题，于1987年在母校四川大学的出版社出版。我也发动我的姐姐、爱人和朋友们来翻译这批资料。但是当时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求出版社“自己找饭吃”，对此类学术价值极高，而市场效益平平的著作，没有谁愿意接手出版。这是凭一己、一会之力所不能克服的困难。翻译工作也就搁置下来了，甚为遗憾。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随着所带学生的增加和成长，我越发有了紧迫感。

2010年，重庆市政府设立政府资助出版的专项资金，这给那些社会效益很好，而市场平平的出版物提供了机会，出版了一批好书。2015年，重庆市文化委在规划“十三五”期间出版项目时，我提出了将我30多年来搜集到的，近代以来外国学者、作家、政治家、记者撰写的有关重庆的著作翻译出版，从全球视野观察重庆，解读重庆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我的提议得到了项目评审专家的一致赞成，便由重庆市文化委列为重庆市“十三五”期间的出版规划项目。尽管这离我知道并接触这批史料快40年了，但40年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就是这个项目的出版物。它是近代重庆历史的原始记录，是城市文化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今天用全球化视野研究重庆的独特史料。它告诉我们，重庆史就是中国史、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这对于今天的中国和重庆都是一笔珍贵的遗产，值得倍加珍惜。

近40年前，我开始研究重庆史的时候，早已有西方人记录和研究上海历史的著作中译本出版，而重庆则一本没有。我希望能改变这种状态。今天，《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的出版表明，我们不但有了，而且是一批。作为这段历史的经历者、见证者，我是感到欣慰的。

回望来路，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进入城市史研究领域的，更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没有机会来做这些事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是重庆学界改革开放40年的一项成果，也是我们向这个伟大节日的一份献礼。

集40年之经验，“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为后代续传统，为国史添篇章”，已经成为我们的理念。城市史研究只有与城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蓬勃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面向第二个40年，我们会不忘初心，继续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学术的支撑。

当此《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出版之际，我们以此告慰那些在我们学术成长的道路上提携、扶持、关心、爱护过我们的老前辈。更

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建设城市文化，造福人民群众，嘉惠学人后人。

2018年7月1日

本土和全球化视野的双重观察：

立德乐和他的《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
贸易与旅行》

周 勇 惠 科

英人立德乐是第一个充当开路先锋入侵四川、重庆的外国商人，是第一个在重庆设立洋行经营商贸的外国人，是第一个亲自率船开通川江航道驶抵重庆的外国人，是在四川和重庆近代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西方第一人。这部《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由立德乐亲笔撰著，1888年在伦敦出版。这是一部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考察备述无遗的著作，向我们展现了这位英国商人第一次踏入重庆的历程和他的见闻，也从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展现了130年前的重庆城市面貌和重庆人的精神风貌。

一、我对立德乐重庆事迹的接触与研究

我最早接触到立德乐的事迹大约是在1980年夏天。那时，我在四川大学读书，从这年春季学期起，由胡昭曦先生教我们学习隋唐两宋史。当时，胡昭曦先生正在整理《圣教入川记》，准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圣教入川记》是由天主教川东教区主教古乐东撰写的，它记载了明清以来天主教进入四川的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国门刚刚打开，学者们对洋人在川的事迹不甚了了。因为川东教区设在重庆，因此胡先生嘱我调查了解古洛东及其撰写出版《圣教入川记》的情

况。我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费了很大劲，几乎是无中生有地挖出了古洛东和他的《圣教入川记》的前世今生，写成一篇大约 2000 字的报告，向先生交卷。虽然只是一个轮廓，还比较肤浅，但胡先生还算满意，在正式出版的《圣教入川记》中，特别提到“七九级同学周勇”云云。正是在这个暑假，我第一次知道在重庆近代历史上有一个洋人叫“立德乐”，做了不少在重庆历史上“第一”的事情。而这次对《圣教入川记》和古洛东的调查，也成为我学术活动的起点。

或许认为我孺子可教，在此之后，胡昭曦先生便开始指导我这个尚在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写学术论文。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胡先生在川大读本科时，就曾研究过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作为他的毕业论文主题。但因毕业后学校安排他转攻中国古代史，这个研究就中断了。他非常希望我能继续研究这个课题。所以，我就在胡先生的教导下继续着他 20 多年前的研究课题。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又把我推荐给了以研究四川近代史，特别是四川保路运动史而著名的隗瀛涛先生——他也是胡先生本科时的老师——由他来继续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在隗瀛涛先生门下，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我完成了《重庆开埠史稿》一书，于 1982 年底内部出版，1983 年《重庆开埠史》正式公开出版。这部著作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英国强迫重庆开埠的历史过程、法律依据、开埠标志、影响作用，展现了西方列强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对四川的侵略，揭示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变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思潮的出现，资产阶级政治团体政党的成立与运动等。一直写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在重庆的统治，建立蜀军政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得以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立德乐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四川的先锋，开辟川江航道，夺取川江航权，在重庆开办工厂，从事贸易的历史。这些史实较多地是从 1964 年印行的《重庆工

商史料选辑》^①中引用立德乐《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②的内容而来。我感到，这部书对于重庆近代历史乃至中国西部的历史，实在是太重要了。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立德乐的原著，把这部书翻译出来，把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深入地进行下去。

1983年我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回到重庆工作。这一时期，改革和开放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历史学研究进入了从复苏到逐步发展的新时期。重庆也成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第一个大城市，实行经济计划单列。我在重庆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在隗瀛涛先生指导下，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重庆史的研究，相继出版了《辛亥革命重庆纪事》《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两部著作。到1986年，又加入到隗瀛涛先生主持的国家“七五”期间重大项目《近代重庆城市史》的研究团队之中，担任学术秘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协议。1988年，密大历史系一个中文名叫魏茱棣（Judy Wyman）的女博士候选人来到川大进修，从事重庆近代社会变迁研究。这是川大历史系对外合作的开始，因此学校非常重视，成立了以隗瀛涛先生为组长的指导小组。先生嘱我也参与其中，负责在重庆接待魏茱棣，给她介绍重庆历史，尤其是帮助她搜集资料、寻访人物。这个“洋学生”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学人，她热情开朗执着，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重庆，孜孜于100年前晚清重庆历史。她刚来重庆时，中文不怎么样，讲话也结结巴巴的。而我的英语口语比她的中文讲得还差，我们大多数时候都说汉语，偶尔夹点英语单词。她最大的收获是熟悉了语言环境，入了中国近代史这个门。大约呆了一年，她就回美国去了。

1988年11月，她又来到重庆，一问，还是来查阅资料，继续她的

①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委员会、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1964年内部刊印。

② 立德乐的这部著作即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引用者曾将其翻译为《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后本书以《扁舟过三峡》为译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次再版将其译为《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因此，本文在提到历史上的这部书时，凡不是特指，统一使用该译名。

博士论文写作。原来，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非常宽松的，先在学校呆一段，然后外出工作，一边挣钱，一边申请课题，一边继续研究，完成博士论文。她来重庆后送给我两件礼物，一件是1972年由中国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立德乐的名著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另一件是由法国传教士华芳济（P. Francois Fleury）1899年在重庆写下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经过》，就是著名的《华司铎被虏记》，还是公开发表时的法文原件版。这可是研究中国近代教案，尤其是大足余栋臣教案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呀！我真是如获至宝。

这一时期，魏荣棣的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原来她到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学习中文口语和古汉语，当时她已经能到四川省档案馆查阅近代的巴县档案了，因而我们的交流完全可以用汉语进行，几乎没有障碍。她告诉我，她找了一份带旅游团的工作，既挣钱，又可常来中国查资料。后来，她到重庆住了好长一段。她的钱也不多，不能老住宾馆，于是我介绍她住进了重庆若瑟堂的招待所。若瑟堂是原法国天主教川东老教区的本堂，现在是重庆市天主教三自爱国会所在地。当时那里没有暖气，重庆的冬天阴冷潮湿，北方人都受不了，何况一个老外。但魏荣棣坚持下来了。那段时间，我带她考察重庆旧城那些老地方，尤其是与教案有关的地方，蹇家桥、小什字、七牌坊、佛图关、大梁子……魏荣棣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她甚至交上了川剧演员朋友。由于这个原因，她与我爱人、儿子甚至我的父亲都熟悉起来。我们也成了研究近代重庆历史的合作伙伴。

从拿到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起，我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随即便请我的爱人郭金杭女士和重庆师范大学的谢应光教授分两头翻译这部著作；请我姐姐周敏翻译华芳济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经过》。翻译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便停滞下来。原因是，那时的出版社要自己找饭吃，对此类学术价值极高，而市场效益平平的著作，没有谁愿意接手。这样，周敏翻译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经过》，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以单行本内部出版的方式印制出

来，供学术交流。而立德乐的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则没有译完，未能面世。这也成为我的一块心病。

在此之后，立德乐的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曾被译为《扁舟过三峡》，编入一套地理丛书出版过。不知何种原因，其译文一是内容不全，二是翻译不准确。因此，我仍盼望能推动一部完整准确，可用于史学研究的中译本问世。

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2010年，我在宣传部工作，与新闻出版局联手，推动设立了由重庆市政府资助出版的专项资金，这给那些社会效益很好，而经济效益平平的出版物提供了机会。几年来，出了大量的好书。2015年，重庆市文化委在做“十三五”期间出版规划时，我提出了《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的选题，该选题旨在将我30多年来搜集到的，近代以来外国学者、作家、政治家、记者、军人撰写的有关山城重庆的著作翻译出版，从全球视野观察、解读重庆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我的提议得到了项目评审专家的一致赞成，这套书便由重庆市文化委列入重庆市“十三五”出版规划资助项目。立德乐的《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则成为这套丛书的第一个选题。但时过境迁，我的爱人因冗务缠身，翻译工作就只能仰仗谢应光教授独自承担了。现在，这本书即将问世，了却心愿。这离我知道此书快40年了；离我拿到此书，也已经30年了。

二、立德乐和他的时代——英国对中国长江上游的觊觎与考察

立德乐是西方列强的开路先锋，他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19世纪中叶，继东部部分沿海城市陆续对西方国家开放后，长江上游广阔的市场、丰腴的物产以及繁庶的人口，又成为了列强竞相逐利的场域。长江上游的西部市场是英国日思夜念的，尤其是四川省，而其门户重庆更是首当其冲。1864年，英属缅甸驻上缅甸首府曼德勒的代表

威廉斯 (C. Williams) 谈及: “四川人口约 3000 万, 拥有约 12 个第一流的城市, 据寓居八莫的中国人告诉我, 四川生产丝的量 and 质都高于其他省; 出产的茶叶也属上乘且产量丰富。同时, 还有大黄、麝香等各种药材以及在云南曾经发现过的多种矿产。”^① “1872 年, 英国的商会联合会写建议书要求扬子江上游对外国轮船开放, 以便 ‘中国最富足勤勉的一省 (四川) 可以直接与欧洲交通。’ ”^② 而川东的重庆是整个西部物资集散的中心, 在西部的经济发展链条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然引起有英国人的注目。在华的英商团体经过一番考察指出, 重庆作为四川省的心脏, “各类外国商品、金、银、铜、锡、铅、煤、白蜡、麻从此地运往各地。重庆是拥有 50 万人口的纯商业城市……该商业中心向外国贸易开放, 会产生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③ 在 1869 年时, 上海的英国商会曾选派了两名代表从长江上溯到重庆, 搜集有关中国西部商贸的所有信息。应商会要求, 英国驻华海军总司令凯佩尔 (Admiral A. Keppel) 还令两名海军军官陪同考察长江航道。^④

从 19 世纪以来, 英国就掀起了一股 “游历” 中国西部的热潮。尤其是 1876 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准许 “洋人” 进入中国内陆, 更成为外国人踏入中国内地游历、考察、传教的保障与凭证。此后, 大量英国人渡海远道而来, 溯江而上, 踏进这片少人涉足的陌生疆域游历、考察, 他们身份各异、目的多样, 有的是直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有的是探险、游历, 间接地向世界传递出西部的社会信息。他们常将沿途的见闻诉诸笔端, 回国后到处演讲, 并以日记、游记等形式出版发行, 扩大影响, 也为我们今日进行学术研究留下宝贵的参考资料。

①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41,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14. 转引自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46 页。

② [英] 伯尔考维茨著:《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 江载华、陈衍译,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第 133 页。

③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35,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57. 转引自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46 页。

④ Alexander Hosie, M.A., F.R.G.S., *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u-Ch'uan, Kwei-chow, and Yun-nan*,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LTD, 1890, p.217.